



徐宝锋:前些日子跟麦家聊天,他说起您翻译了他的《解密》,刚译完《人生海海》又马不停蹄地开始翻译《风声》,很是感慨。您为什么这么喜欢麦家?

郝麦特:因为麦家跟我说,我是郝麦特,他是麦家,我喜欢他,乃是“名”中注定。一句玩笑半分真嘛,我还专门去查了“麦”这个字,古代中国人把“麦”看成上天所赐、来到人间作食粮的东西。那看来,我跟麦家的相识,颇有命中注定的意思。我们第一次见面在2019年4月,德黑兰国际书展中国主宾国系列活动上,麦家出席《解密》波斯语版首发会。那是麦家第一次来伊朗,《解密》也是我译的第一部中国小说。

翻译这部小说,也是奇妙的缘分。那时我刚好参加了北京的图书展,碰到了我们伊朗的出版社。他们说麦家不错,人跟作品都很好,推荐我翻译他的《解密》。其实,在这之前,我在中国就看过《解密》的电视剧。我舍不得每天都看,非要忍着,擦起来看个痛快才行。这个翻译的机会像个礼物,惊喜又珍贵。麦家这本书,据说写了11年,被退稿17次,我拿在手里都觉得心里发烫,这要怎么译啊!这本书我专心地译了好几年,我希望把经典译成经典,不辜负他11年的努力,不辜负伊朗读者的期待。翻译期间,我跟麦家始终保持联系,我也不断透过他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形象、他语言传达出的信念与思考和书信中字里行间的气质来勾勒着他的形象,体验着他的心理状态。

我首先是读者,而后才是译者。读者是什么?是与作家共同完成作品的人。译者呢?是让这一可能得以实现的条件。我记得麦家在发布会上说,“直到读者用眼睛去打开书里的世界,这本小说才算完成”——他目标意识很明确。他的书,是为所有可能的读者而写,他心里装着不同文化背景里的人,而且是具体的人。那么,探索的方向就不一样,矛头指向个体命运的构成,指向分析构成个体命运与时代特性的复杂合力;特殊时期的政治与历史事件就成了厚重且透明的背景,托得起故事,又不把他拒之门外。所以,他的作品有民族个性、有时代性,但没有时空、地域隔膜。在对读者的“邀请”上,他很主动。这也是我在翻译的时候直接感受到的:不是他本人或者出版社邀请我去翻译,而是他的作品开口说话,要求我去翻译。

《解密》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被企鹅经典文库收录,不是偶然的。有种观点认为,麦家流行是因为特勤小说的类型优势,我觉得不尽然。《解密》包括我正在译的《风声》,都不是好莱坞式小说,更不必说我刚译完的《人生海海》。麦家在故事里思考,“悬疑”就是他的思维工具,他用加密去解密,

同时也用解密去加密,无论读者补充了怎样的答案,小说都是未完成的。所以,对读者来说,感受到的总是无尽的“抽屉”——这是命运的痛点,也是希望所在,所谓“海海”——就像他在《人生海海》里引罗曼·罗兰说“英雄主义”一样。麦家的魅力在这里。

徐宝锋:相比《解密》《风声》,《人生海海》确实有风格上的转型,虽然延续了悬疑式书写,但写作所触及到的范围不同了,逐渐向乡村、向自己的童年延伸。这本书在中国非常火,问世不到两年就突破200万册,成了近年中国图书市场难以复制的神话。您觉得它在伊朗的“际遇”如何?

郝麦特:它能再创一个“神话”。《人生海海》这本书,麦家写了5年,动笔之前,他大概有3年没写作。我在翻译的时候,心里总装着他“留白”的这三年。一千多天,他在想什么,在找什么,最后感受到了什么,才能让他把笔伸出“暗箱”,去探访他讳莫如深的东西?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一本小说不管怎么厚,可能总归有点“薄”;但对于译者来说,这本300多页的小说,非凡的厚,因为它要求你把每个字揉碎,萃取汁液,放到作者的生存心路和我自己的文化背景中重新整合。这个过程是作者与译者在相互考验,我需要理解这部作品的书写对麦家本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同时需要知道它会如何触动伊朗人。作为一部“转型”之作,“转型”本身的吸引力只是延续他先前作品受欢迎程度的惯性,但我知道它里面包裹着一个新的马达,它不需要吃老本。麦家用3年做了一个决断,他决意直面道德与命运构成的问题。毋宁说,伊朗的读者也就从那时开始等,要等到我的译本今年出版,才能感受到这个决断的力量。这么多年积蓄起来的期待,能等到了,等着英文版先出。让读者等着,也是蓄力。

徐宝锋:所以,你的《人生海海》会成为英语世界的中介。译者承担了好几条“交通线”的枢纽,不只是商业的、语言文字的,还有文化和审美的、更根本的,或许是心理的、精神的。我读过菲尔多西的《列王纪》,也很喜欢萨迪的《蔷薇园》和哈菲兹的抒情诗,当然还看了不少伊朗电影,例如马基德·马基迪的《小鞋子》,阿斯哈·法哈蒂的《一次别离》和《过往》。去年,他的《一个英雄》还代表伊朗角逐第94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奖。

郝麦特:上个月我刚去电影院看了这部电影,忽然觉得一阵熟悉:这个“英雄”非常像《人生海海》里的上校。这两部作品都在讲一个“英雄”的出现和陨落,麦家和阿斯哈·法哈蒂都要把“英雄”和“小人”放在同一个人物的命运上,剥开来给人看。残酷,却又回归到波澜不惊的美。“英雄”是个“道德命题”,也就是说,只有在道德困境中,才有“英雄”出现。所以,“英雄主义”的基调是宿命论的,悲剧性的。与此同时,你在反思之后,能看见命运最

郝麦特(Hamed Vafaei),德黑兰大学中文系教授、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合作处副处长,曾任伊朗驻华大使馆翻译。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文化、中伊文学翻译等。主要学术著述有《中国黄金时代诗学研究》《波斯文学在中国传播与翻译》《波斯文学:探索丝路的一把金钥匙》等。

□徐宝锋



郝麦特(左)与麦家

终的密码,那如同麦家用解密的方式加密过的:“海海”——波澜壮阔,无边无际,看清了惊涛骇浪的真相,就是一往无前的热爱。英雄主义是逼迫悲剧发出光芒的信念,那种光是悲剧内的力量,能达到跨文化的审美共情。你去看《一个英雄》,也会像我看《人生海海》一样,内心感受都被对方照得亮堂堂。翻译,就是把蜡烛点亮。

徐宝锋:“点亮”之后,不但能看到“重影”,还能看到外面晃动的闪亮波浪,那大概就是比较文学的收获了:不是求同存异,而是相反相成、相得益彰。

郝麦特:这是更有意思的话题。我一边看《一个英雄》,就一边想,把《人生海海》里的“上校”和片子里的“英雄”做个比较,看看两个国家的人是怎么看待这样一种存在状态的“英雄”的。这就是文化心理的比较,它让我们看到“差异”,并且由于在共同关切中的思考,而理解、尊重差异,那么跨文化对话就变得自然了。心态放平,就能看到相反的东西怎么相成,才能有“相得益彰”可言。

《人生海海》里上校的那两只“猫”,是电影里没有的东西,作为一个象征或者隐喻,“猫”都让我很着迷。我不是说这种动物或者它的形象本身,你也知道在波斯的神话或寓言传统里,猫真算不得有脸面的东西。不过,麦家的“猫”,让我看到了更多可能性:它代表的是生活本身,是常识,是日常的世俗生活的自足。你可以说这是道德上的洁身自好,不与荒谬的理念同流合污,你也可以说它是不道德的漠不关心、麻木不仁。但正因为你深知深陷道德囹圄的上校和被理念利用以致疯狂

的人们真正缺乏的是什么,你就更珍惜日常生活与世俗常识的价值。那不是高尚也不是无耻,而是道德之外的另一种东西,人们依靠它可以看清道德困境何以形成的参照物。《人生海海》的主角,不是上校,而是他的猫。我总感觉,这猫有种“天地无仁”的气度,所以上校就是为了它,回了乡下。当然,这还是执著。等他疯了,这份执著就没有了,他也不再认识他的猫,甚至林阿姨教他养猫,他都学不会。但他养蚕,养得无与伦比的好。他真的回归生活了,也就活成了他的猫,不必再养猫了。

徐宝锋:这样的理解,或许不是大多数波斯语读者能捕捉到的。它需要丰厚的文化背景支持才行。

郝麦特:对,所以,我也经常跟我学生们讲,中国当代小说的确是很“新潮”的,但它都是有根的,这个根在中国文化的传统里。你们不深入到中国的文化深处、它的哲学底子里,是译不好的,你们自己欣赏尚且不过瘾,读者更难品出厚味。翻译从来不只是一个语言问题,你得让自己像海一样,才能把人生“海海”的味道译出来。所以,学院里的中文教育和中国文化教研需要同步壮大;中国文学体量巨大,那么组织翻译协会、激发众多译者的力量,就必不可少;中国当代文学处在上升期,好作家好作品层出不穷,我们国外译者相当需要诸如“经典互译”之类的项目,就像我看到你身后墙上的那行字“文化互译、沟通世界”,翻译的作用,正是如此。我翻译的《解密》已经再版三次了,我对《人生海海》充满信心,对《风声》也是一样。不仅是麦家,贾平凹、陈忠实这些优秀的中国当代作家汇聚起来,逐渐会在伊朗形成一股潮流,因为你们和我们都在努力,为文化传播、为跨文化的心灵对话、为沟通世界而努力。

(徐宝锋系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用翻译点亮海海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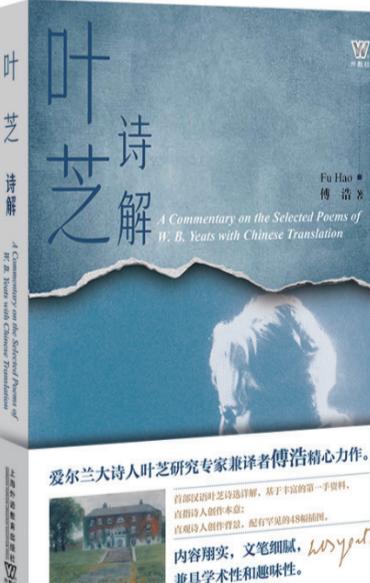
——访伊朗文学翻译郝麦特

□徐宝锋



解说叶芝:瞄准作者本意

——傅浩访谈 □傅浩 周颖



周颖:爱尔兰诗人、剧作家叶芝是192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也是西方文学从浪漫主义向现代主义过渡时期极为重要的诗人。早在20世纪初,中国就有对他的介绍和翻译,茅盾曾经译过他的剧本《沙漏》。之后一段时期,英美文学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比较密集的翻译和真正深入的研究,应该是在80年代以后。请问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翻译这位诗人的作品?

傅浩:是的,国人重新认识叶芝应该是始于《外国现代派作品选》(1980)中收录的袁可嘉先生翻译的七首叶芝诗。我是1983年开始翻译叶芝的,当时在上大学二年级。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拿着自译的《叶芝诗选》手稿去某出版社,编辑们都还没听说过叶芝之名。两年后,初次在《国外文学》季刊上正式发表了五首译诗。10年后才有机会出版《叶芝抒情诗全集》。

周颖:国内叶芝诗歌研究与国外相比,是否存在一定差距?如果有,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能否请您就此谈谈叶芝在中国的翻译与研究现状?

傅浩:当然,差距很大。第一手的基础研究都是国外学者,尤其是英语国家的爱尔兰裔学者做的,例如Scribner版的多卷详注本《叶芝作品集》现已成为叶芝研究界用的标准文本;牛津版的多卷本《叶芝书信集》的编纂工作仍在进行中。我们只能在这些基础上尝试理解叶芝,表达自己的看法,而国内研究的普遍问题在于理解得还不够,“读人”的现象较多,选题重复的也不少。对于我们来说,翻译是理解的第一步。叶芝的作品翻译成汉语的还不算太多,有许多重复的翻译,甚至还有抄袭的。而有些研究者对译本的依赖较重,却没有能力分辨译本的好坏。

周颖:您的新著《叶芝诗解》提供了详解和导读,我想可以将之视为改变目前叶芝研究现状的一种努力。我注意到您编译过好几本叶芝诗集和诗选,也写过他的评传,请问这一本同前面几种作品有何不同?

傅浩:是的,这本书着重于对文本的理解,瞄准叶芝诗的

作者本意,虽然这一目标在实践中似乎永远也达不到,因为即便你说对了,作者也不可能从地下起来加以认可,更何况还有理论声称,连作者说了也不算。我现在对叶芝的了解和理解都远胜从前,目前这本书里就有一些独到的发现,纠正了一些国外学者的谬见,或者见他们所未见,部分内容已作为先期成果在国内外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外国学者中也不乏胡乱发挥者,只要掌握了充分证据,就不难把他们驳倒。我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就发现了许多新材料。这本书是作品评论,诗集是作品翻译,译传是作家研究,可以说共同构成了我的叶芝研究三部曲。诗集已经增订过。译传现在看来单薄了些,接下来准备着手修订。

周颖:您怎么会想到写这么一本书,它是我们单位创新工程的规定动作,还是基于您研究兴趣的自选课题?

傅浩:我从来不做规定动作。说来可笑,这本书的缘起是赌气,因为另有出版社曾约我撰写类似的书没有谈拢,于是就另起炉灶自己干。另外,主要还是有感于叶芝被译介到国内这么多年了,一般读者甚至学界对他的理解还远不够准确和深入。

周颖:书的标题是《叶芝诗解》,绪论题目为“解说的必要”,请问解说为什么是必要的?

傅浩:常言道,诗无达诂,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也许正因为此,才需要专业的解说。最好的解说只有一种,那就是最接近作者本意的解说。如果把文学解说比做打靶,那么作者本意就是靶心。解说是文学研究者应有的职责。任何艺术都不仅需要一般的欣赏,而且需要专门的研究,以发明艺术创作的规律和机制。严肃的文学读者需要专家的指引,从文本中“读出”更多原有的意蕴,而不是往文本中“读入”自己的解读。

周颖:谈到对诗歌的解说,我们想知道,需要解说的是什么?是作者的本意吗?美国新批评派批评家维姆萨特与比尔兹利提出“意图谬误”的概念,反对将诗歌的意义归于作者的写作意图。这种理论一度流行,影响很大,直到现在还有人奉为圭臬,请问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观点?您认为什么样的解说才是理想的?

傅浩:的确,只有作者的本意才需要解说,因为除此之外就是读者各自的理解了。它是文学解释学所一贯追求的目标,哪怕只是一个不可即的理想。也是一般读者所谓要读懂的东西。新批评的文本自足论虽流行一时,但已被证明是有所不足的,对此我在绪论里有详细介绍。理想的解说当然是面面俱

到,无微不至,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不限于文本本身,还及于文本之外相关的一切,但一切都必须是有理有据的,不臆测,不妄说。

周颖:文学和文化,不论古今中外,都有解说的传统。中国有经学传统,西方有解释学传统。请问您是如何进行解说的?请您大致谈谈您的研究方法。

傅浩:中国的经学与西方(犹太教和基督教)乃至印度的解经学(佛教和印度教)有许多相通之处,可以说异曲同工,殊途同归,都既有音韵训诂、寻章摘句、死抠字眼,又有借题发挥、穿凿附会、臆断强解的情况。我对所有方法都采取工具主义态度,适用的就拿来用,所以我的方法吸收了中外传统解经学以及现代文学解释学的合理成分,既有对个别词语和典故的释义,又有对段落大意的串讲;既有文本体分析,又有传记心理剖析;既有社会-历史背景参照,又有不同文化元素比较,不一而足。总之,方法是为服务的。方法是手术刀、钳子、剪子、镊子,目的是解剖然后再缝合文本。这个比喻也许不恰当。然而,仅仅靠望、闻、问、切揣摩之法,所得就可能多半是主观印象。真正的好诗是经得起细致剖析和反复阅读的。我相信,读者在读过我的解说之后,回头再读叶芝原诗或译诗,感觉和理解多少都会有些不同吧。

周颖:您在2018年出版增订本《叶芝诗集》,这是迄今最全的汉译叶芝诗集,一共收入叶芝诗415首。《叶芝诗解》选了其中89首,详加解说,请问您在遴选时,依据的是什么标准?

傅浩:主要是看作者本人对该诗有无直接解说或间接涉及的外围文本,这些是作者本意的最好证据。这89首诗是我目前能找到的较符合条件的作品。再说篇幅也已经够大了。好在这本书的结构是开放的,以后若有更多发现,可以在再版时增补进去。实际上我已经又有新的发现了。

周颖:我读叶芝的诗,总觉得有一种神秘色彩,请您解释一下他为何给人这种感觉。这里边是否也有包括中国、印度、犹太文化在内的东西文化的影响?

傅浩:叶芝是个非常迷信的人,喜欢怪力乱神之谈,热衷于星占卜降神乩笔等各类法术实践。这些趣味和特质在其诗歌创作里难免会或隐或显表现出来。他的文学象征主义其实就主要源于他的神秘主义知识,是后者在文学中的自觉运用。他受印度宗教文化影响较多些,与源自犹太教的基督教喀巴拉秘学也颇有渊源,也直接或间接接触过一些日本和中国文化,但较肤浅。他早年采集整理过不少爱尔兰民间精灵鬼怪故事,中年以后又系统地读过一些西方唯心主义哲学著作。这些或多或少对他的诗歌创作都有影响。对于神秘主义在他的诗歌创作中的具体体现,我在书中有关深入细致的评述。

周颖:今天我们提到叶芝,大家都会想到他的名作《当你老了》。国内还有人把它改编成流行歌曲,广为传唱。这首诗是叶芝写给他痴恋的对象莱德·冈的,文辞优美,情真意挚,很感人也很感伤。莱德·冈与叶芝性情不同,道路有别,似乎

从未真正回应叶芝的爱情。这始终没有回报的爱,怎样影响了叶芝的创作?诗人抱有一种怎样的爱情观?这首诗有很多种译文,请您讲讲译这首诗的心得体会,或者说您的独特发现。

傅浩:“当你老了”在汉语中是个不合语法的病句,现在以讹传讹,流毒甚广,大有积非成是之势。这个问题我公开讲过多次,但人们的成见已很难纠正,不少听众还找我理论呢。我的译法是《在你年老时》。西方抒情诗里,爱情是一大主题;而爱情诗里,单相思是一大主题。这首诗即是一例。莱德·冈曾对叶芝说:“世人会因我没有嫁给你而感谢我的。”意思是说对他她的单相思催生了许多优美的情诗。叶芝则对莱德·冈说:“我尽心竭力/用古老崇高的方式把你热爱”,可见对他她一直是怀着准柏拉图式的爱情的。至于《在你年老时》这首诗的翻译和研究心得,还是请见拙著吧。我在书中有关的解说。

周颖:听您说过,学问是种子,读书人有责任把它播下去,让它生长,开花结果,不然就白学了。在英美室的老先生中,您的老师袁可嘉先生也是国内著名的叶芝译者和研究者,我想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学问传承,更具体地说,是英美室的学问传承。您译叶芝,有没有受袁先生影响?您的翻译和翻译理念,与老师有何异同?

傅浩:我就是在看到袁先生在《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中的译诗之后才知道叶芝的,也是从那以后才开始翻译叶芝的,大三的时候已译出了收有近百首诗的《叶芝诗选》。1987至1990年我从袁先生读博士期间,我们从不谈论叶芝。我的《叶芝抒情诗全集》(1994)早于他的《叶芝抒情诗精选》(1997)问世。袁先生的译文平白如话,读起来较顺口;我早期的译文措辞较典雅,形式也较拘谨,后来经过多次修改,订正了不少错误和不当之处。本书中的译文是最新修订的版本,应该错误最少,风格也更接近叶芝原诗。原诗语言与日常口语还是有些距离的。

周颖:您从事外国文学研究,但同时有很扎实的国学功底,非常重视中国传统文学,鼓励年轻同事多读国学经典,也曾经在所里给大伙儿开课,讲授《大学》《中庸》《论语》,很多年轻同事由此受益。平常在室里聊天,常听您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刚日读经,柔日读史”。请您谈谈母语文化涵养同译者修养的关系。

傅浩:我一贯认为,具备一定的传统文化修养是学者的本分,尤其是人文学者。大而言之,任何人都应该知道自己的来历。具体对于译者而言,母语和外语犹如车之两轮,发展若不均衡,必然会导致翻车事故。母语和外语的修养一样,都不应只懂一点当代语言和文学,还应该熟悉从古至今各种文体,不仅会读,还会写。只有这样,两种语言转换起来才能得心应手。所谓取法乎上,这是我们大家都应该为之努力的方向。

周颖:谢谢您回答我的问题。译事难为,我自己也做一些翻译工作,深知其中艰辛。诗歌很凝练,涉及私密的经验,相当个人化,从形式上看又是很片段的东西,所以翻译诗歌很不容易。读者即使读到翻译,仍有不明所以的感觉,您这本《叶芝诗解》既提供了译文,又有以扎实研究为基石的细致诠释,对外国文学研究者和喜欢叶芝的读者而言,应当是一个福音。

(周颖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兼硕士研究生导师)